



冲浪集

● 宋贵生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颇具风格的报告文学小说集。

本书所收辑的10篇报告文学，主要写改革开放以来，农村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和农民企业家。他们大都具有鲜明的独立意识和开创精神，既有远大的理想抱负，又有百折不挠的坚韧和实干精神；他们敢于解放思想，勇于冲破农村中一些陈旧观念对自身的束缚，大胆改革，锐意开拓，并最终取得了成功。

此外，本书所收的两部中篇小说也很有特色，内涵颇深，耐人思索。

马烽的信(代序)

宋贵生同志：

信悉。

《长平》文艺创刊以来，一直赠送我，对此表示感谢。老实说，我并没有期期认真阅读，因为该读的文件、报纸、刊物很多，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。但每期我都要浏览一下，偶尔也读几篇。总的来说刊物办得不错。这个“不错”绝不是客套话，而是由以下几点印象得来的：

其一，我没有发现《长平》刊登过那种低级下流的作品，也没有发现那种跟风势、赶浪头、一般人读不懂的时髦货色。而是按照自己的办刊方针，走自己的路；

其二，没有到处拉名家的稿件，壮声势、装门面。而是以大量篇幅发表本县青年作者的作品。发现、培养，团结本地作者，可以说是地方刊物，特别是县级刊物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所谓培养，发表他们的作品是一个重要手段。即使这些作品水平并不很高，但也应该尽可能给以发表的机会。当然不是来稿就照登，事实上也办不到。而是要从众多的来稿中加以选择，提出意见，让他们修改或帮他们修改。对初学写作者来说，修改过程也是个提高的过程。发表作品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。有时候发表一篇作品，可能决定他今后坚持业

余创作的道路。这样做，编辑们当然要花很多的精力，但对整个文学事业是很有意义的。你们这几年已经发现培养了一些新的作者，这就是最大的成绩；

其三，从我浏览和读过的一些作品来看，绝大多数都是反映当前现实的，贴近时代，贴近生活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《长平》刊登了不少报告文学，有的排在了刊物首位。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，你们办这个刊物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。报告文学要写好也并不容易，但这总比坐在家里胡编乱造所谓小说要好一些。这既能及时反应现实生活，又可积累创作素材，还可以给县里的改革以支持。这是一举数得的好事。在这方面你带了个好头，希望你能坚持下去。

以上所说，算是我对那个“不错”的注释。

顺便再说一点：这几年你所写的那些报告文学作品，我大体上都看过，其中所写的主要人物，有的我还认识。比如：《木森的心愿》，是写炼铁专业户常木森的。前几年去高平时，我曾去他那里参观过，也和他本人有过交谈；《一个农民的峰巅》是写养猪专业户毕生才的，他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，今年春天在北京开人代会时，也和他交谈过。他们都是现在农村中有代表性的先进人物，你算是抓住了两个值得一写的对象。以我对他们粗浅的了解，如要和你的作品两相对照的话，我感到你的文章写得真实可信，既没有为突出所谓英雄模范故意拔高他们；也没有为突出他们的个性故意添加一点佐料。可以说是“文如其人”。我认为，真实或者说实事求是，是报告文学的灵魂。

如果要我谈问题的话，我认为你的语言文字值得作一番研究。文章中基本是群众语言，但也混有知识分子腔调，古

文与现代语并举，中国典故与外国典故都用。看来你可能是想创造一种自己的风格。把各种语言文字的优长熔于一炉。这没什么可奇怪的。我认为有些地方溶合的比较好，有些地方给人一种芜杂的感觉。不是溶于一炉，而是混成一锅了。读起来很不顺畅。不了解那些典故的人难于理解，不知所云。希望你在这方面再下点功夫。

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仅供你参考。

敬礼！

马 烽 1988年9月1日

目 录

马烽的信（代序）·····	（ 1 ）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报告文学

传统文化的冲击波·····	（ 3 ）
成功的性格·····	（ 37 ）
合法的等待·····	（ 68 ）
黄土地上一枝梅·····	（ 85 ）
一个农民的峰巅·····	（ 120 ）
阳光明媚，他却没有歌唱·····	（ 153 ）
出墙红杏·····	（ 185 ）
木森的心愿·····	（ 202 ）
军魂·····	（ 214 ）
王伟，无险惰性的冲浪者·····	（ 234 ）

中篇小说

魔窟藏娇·····	（ 271 ）
打不死的虎·····	（ 323 ）

报告文学

传统文化的冲击波

——卢天堆“出山”前后纪实

引 言

黑格尔说，人死于习惯。

然而，人若意识到习惯是一张巨大的害人魔口，反目逆道，舍身求法，跳出了这张魔口，他的命运将如何呢？

也许习惯这一恶魔还会来敲他的门吧！卢天堆如此而为后，出任东宅村党支部书记，仅仅一年多时间，便锋芒初露，魔术般办起六个厂，拿回了十三万元的收入。这已经比他出任前的年收入提高了九倍，但奇迹还不在于十三万，而是他搞来的那颗神秘的“星星”——黑陶工艺。它魅力无穷，招来了“兰岛”，“皇冠”呜呜的往庄里跑。那些村南村北取之不竭的红土，变成了日内瓦国际博览会上高

雅的艺术展品，自然在国内亦是“热门”。当这些产品在太原、北京、广州的工艺市场一露面，立刻受到了人们的青睐。争相订货的有，为包销全部产品而主动提出投资的也有。究竟这一项目今后的潜在优势有多大，姑且不去估量，单讲当年，就可拿回产值三十多万元。为此，人们不能不对卢天堆刮目相看了。

也难怪人们诧异，在太行山里，卢天堆生活的这方水土上，从古至今，人们几乎是一个生活模式——除了农耕，便是挖煤、炼铁、翻沙，故而有人给其送了个不雅的名讳：“黑、大、粗”。而卢天堆居然将那一文不值的红土，变成了星星似的“宝贝”，使焦枯的村民财星高照，眼界大开。这毋宁说，对“黑大粗”是一股巨大的冲击波。人们惊讶，演绎。

“卢天堆这小子做了啥好梦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！真神了。”

好象他这颗星星的摘来，犹如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一样，是从盹然间的梦中所获。

其实，难啊，难于上青天。

卢天堆几乎是从野蛮的啮噬和无形的囚牢中冲杀出来的。

一、变不成人的“猴子”

农村，广袤的农村。

两千年的封建习俗，造就了一种稳固的原始文化模式，犹如建筑了一座无形的“铁屋子”。尽管屋里严重缺氧，甚至把人闷死，而人们还茫然不知，甚至还说，天命如此，死得应该，视死如归，因为他要“含笑九泉”了。

解放四十年，对于这座“铁屋子”不能说没有冲击，但是，四十年和两千年相比，也不过是个刚出生的不满周岁的婴儿，他能离开母体？用柏杨的一句话说，叫老虎戴念珠。老虎就是封建习俗，它还在张着无形的大口吃人，吃人的灵魂。

在东宅这方土地上，除了原始的乡土文化模式，还点缀着一个祖传的“火神爷”，圈着他们的命运。

挖煤、冶炼、翻沙、铸造，铁锅、铁笼、铁炉、铁釜、铁犁、铁铧、铁轮等等，凡农家带铁的灶具和农具，好象一无例外地都由他们“承包”了，而且服务到家。若你的灶具碰了脚子，或磨损漏了，可以随时招手，呼来一位黑眉乌眼的小炉匠师傅，为你把锅补得天衣无缝。对于这位黑黑俊俊的小师傅，你无须打问，无一不是那片土地上的人。

子承父业，代代相传，这种生活模式千载难变。即使有变，也是铁锅变成了铁磅，铁犁变成了铁管，很难变出个陶

瓷厂或丝织厂来。

这种自古形成的文化模式，犹如斯宾格勒论述的那种阿波罗式的命运，更合中国用祖灵造就的那种“铁屋子”。

生活在这种模式里的人，是自足的，也是可悲的。可悲的命运当然也不会轻饶东宅村。

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七年，而这个五百多户的大村，连祖传的土高炉或翻沙厂也未建一个。抑或是怕断了“火神爷”的香火，孤零零搞了一个机砖厂，还是苟延残喘，那哀哀鸣鸣的机声，宛若一首嗟叹贫瘠的沉吟的催眠曲；又象是残喘的“火神爷”所发出的一种悲鸣。

不是东宅人憨傻无能，是“铁屋子”的幽灵衔着他们的灵魂。

卡耐基说：“两个人从牢中的铁窗望出去，一个看到泥土，一个却看到了星星。”卢天堆便是东宅人中看到星星者之一。

他年龄四十出头，依然饱含着青年人蓬勃向上的朝气，只是显得更加成熟和稳健。先天的桀骜不驯，加上后天的风风雨雨的磨炼，逐步形成了他的个性特色：思想深沉，善于思索，不受旧的习惯羁绊，不被世俗和权势所左右，在重大问题上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；一经他认定要干的事，就会竭尽全力，百折不回，愈挫愈奋。

他酷爱读书，博闻强记。早在上初中时，他便从鲁迅的论著中窥到了“铁屋子”的窘压，他决不在“铁屋子”中窒息而死，力图冲破这一无形的罗网，去摘他理想中的“星星”。然而，雏鹰的翅膀再硬，也冲不破这个大铁网。他还未曾起飞，就遭到了种种非议：

黄口小儿，目无祖训，岂不是渎祖叛类！

乳臭未干，就想上天？

啄米的鸡子成不了鹤。“黑大粗”的儿子变不成“白小子”。

鼓噪之音未终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按照常规，象他这样的离经叛道者，昔日任教，既受过校长的迫害；也遭到过“村支书”的排挤，今日运动既来，定会“脱颖而出”、“一跃而起”，闹它个“坐山王”干干。可是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不仅没有配合造反派鏖战，反而还分别走访了这两个“落水狗”，居然相逢一笑泯前仇了。

出格的行为，必然会招来常人的惊讶和愤怒。

这小子和运动唱对台戏，当“保皇狗”哪！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卢天堆，倒要看看你这反骨有多硬。一时间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都朝他这“反骨”砸来了。

自卫还击，似乎是动物的本能，何况人乎？卢天堆逆道反骨，自然有他的缘故，抑或是“超前意识”？也未必过奖。反正既然他有这种主见，就不会被大字报冲倒，何况他手下还有一股势力。于是，他开始以牙还牙，发起攻击了。

两派对垒，热吼冷战了。诬蔑，谩骂，互咬，钢牙利齿的噬噬，棍棒长矛的拼刺，悲剧愈演愈烈，愈咬愈凶。我不能“摘星”你也休想逞能；你要“促生产”，我偏要“抓革命”……可谓两羊抵在独木桥上，大有同归于尽的“英雄气概。”

恕我直言，这就咬成了鲁迅笔下那变不成人的“猴子”。

“……何以从前的古猴子，不都努力变人，却到现在还

留着子孙，变把戏给人看。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说人话呢？还是虽然有了几匹，却终因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，都咬死了，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？”

文化大革命如过眼浮云，两派的争斗如一场恶梦。派仗结束了，但运动所造成的派性恶果却根深蒂固。因为九九不能归一，只好求助于祖先的“中庸之道”，抬出一位站队不偏不倚，行动不紧不慢，工作不上不下的老者来充当“维持会长”，收拾残局。

中庸之道，传统之宝。维持结果，各得其所，皆大欢喜。卢天堆当然只能回到学校，当起了他那颇为得意的语文教师。他确实也干得不错，培养了一批得意“门生”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。然而，师道毕竟是师道，不是能左右人们命运的“政道”。他那寻找“星星”的理想，虽然被压进了潜意识，可还总是不时地泛起，翩翩起舞，出现一些云霞映日的美妙憧憬，于是，他又吟诗写小说，抒发胸中之志。当这些诗文被一些报刊杂志采用后，他的名字被公社领导发现了，“嚯，这卢天堆还有两刷子，咱公社不正缺秀才吗！”好象是伯乐发现了千里马，把他调到公社担任了企业管理人员。

傲霜之梅，不异地而衰。卢天堆在公社没多久，就木秀于林，受到了领导的奖励：可也给他带来了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欲沉”的困境。东宅村那些既得利益者，与其说是嫉妒，不如说是害怕了。这家伙又冒出来了，得陇望蜀，是不是要来东宅当权！哼，老子安眠，岂容你枕旁“鼾声”！卡住他的“党票”，他就是有上天的本领，也只能是大梦一场。此招果然可怕，卡得他几年都是个“变不成人的猴

子”。

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病的标准是人才的价值。把“新秀与智能”当成“出头椽”砍杀，那人才还有什么价值。

国家兴盛，在于人的价值的充分发挥。国如此，村焉能例外。

维持，只能是原地踏步，不进则退。1986年，一个现实的，也是非常严峻的问题，摆在了东宅人的面前——村委全年的收入为一万四千元，而各种费用却花去了五万余元，如加上集资修建乡办中学的摊款，每口人都得从自己口袋里交出四十二元。这一数字一透露，便将本来就不富裕的村民唬得目瞪口呆。于是，埋怨的有，骂街的有，甚至有的党员在会上公然提出：“群众挣钱无门路，拿什么给你们摊？照这样摊，每家五口人，就得有一个人给村委当长工！”

事已至此，原来便以无文化，身体不行，上了年纪等种种理由要求辞职，而乡里却一再要他再“维持”一下的老支书，觉得再也不能干下去了。凄然地向乡党委提出了辞职申请。

二、他毅然抛弃了那个 荣耀的“光圈”

老支书辞职，东宅空下了一个重要人物的位置。

不要把“重要人物”狭义地理解为只是那些叱咤风云的

世界伟人的代名词。东宅一千九百口人的命运主宰者，也是一个小小的“上帝”。

拿破仑说：“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绵羊，能打过两头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。”东宅人是否能从那个窒息的“铁屋子”里冲出来，扑向太阳，就看即将上台的人是绵羊还是狮子。

应该说卢天堆是狮子。

但是，上级党委偏偏没有选中他。

并不是领导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物，而是对他的为人褒贬不一。

褒者曰：天堆超凡出众，不羁一格，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开拓精神，他是东宅村的一头狮子。

贬者则说：他骄傲自大，好高骛远，喜欢独出新裁，却总是“一事无成”。

“一事无成”，显然带有偏见，倘这样，还有什么褒贬可言？人们会齐声喊出“他糟透了”。

那些没有进取精神，却有惊人的记忆力的人们，总是念念不忘他没有干成的那些事情，而从不谈论他没有干成的原因。

是的，卢天堆曾坦率地告诉我说，他在任企业管理人员时，成绩不当自夸。社会自有公论；失败也确有，因为不从失败中获取成功者，只能是那些神仙与上帝。天堆的“失败”，当以车队的亏损和罐头厂的天折影响最大。

那里1981年，乡领导把从煤矿因亏损严重而集中起来的两辆旧汽车交给天堆管理，要求是不赔钱即可。他以一个门外汉受命之后，却没有装腔作势地充内行，而是虚心请教，

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技术专长，当年即获利一万余元，购回了一辆崭新汽车。可是，当天堆刚刚把车队闹腾得象个样子，也就是到了第二年吧，乡领导便将他调出车队，去筹建罐头厂。这次糊里糊涂的工作变动，铸成了两大错误。一是他走后，汽车管理不善，亏损一万余元。二是罐头厂刚准备投产，便传来了红果大涨价的消息。乡里没有办过这类厂，他们左算右算不挣钱，于是一咬牙，宣布罐头厂停建，汽车队解散。领导的这一命令，也许不是朝着卢天堆来的，而卢天堆从此却担上了散了汽车队，垮了罐头厂的罪名，并由此演绎为一事无成。

“一事无成”加于天堆，确有讹传，但天堆并未去正名，他在审思其中之因了。

聪明人与愚笨人的主要区别在于，是否能从成绩中总结经验、失败中寻找教训。卢天堆在失败以后，马上寻根问源，悟出了失败的真谛——是因为没有了自己的脑袋。

人与机器的不同之处，就在于有灵魂，会思维，有智慧，会创造。离开这些，人便失去了自己的真正含义。作为“员”，一切都要受领导的支配，而他自己又总想支配一切。这怎么能不失败呢？他似乎恍然大悟了，只觉全身轻松，超脱般地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：

要想干事业，就必须有自己的脑袋，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1984年，那股集体搭台，个人唱戏的风刮来之后，乡领导又一次让他出去搞购销公司，并答应给他一笔流动资金，他却说，钱我可以不要，权却非要不可，如让我干，一要有人事权，二要有决策权。

乡领导对他的要求，如愿以偿，他便象脱疆之马，自